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專刊
近代學術集林 傅傑主編

夏敬觀著作集

【卷二】

夏敬觀●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虞思徵 編

夏敬觀著作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夏敬觀著作集... 全9冊 / 夏敬觀著.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9. 7
(近代學術集林 / 傅傑主編)
ISBN 978-7-309-14360-7

I. ①夏... II. ①夏... III. ①雜著—中國—近代 IV. ①Z429.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覈字 (2019) 第144295號

夏敬觀著作集 (全九卷)

夏敬觀 著
虞思徵 編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五七九號 郵編: 200043
八六一二一—六五六四二八五七 (門市零售)
八六一二一—六五一一八八五三 (團體訂購)
八六一二一—六五—一〇九一四三 (外埠郵購)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出品人 嚴峰

責任編輯 胡欣軒

印 刷 上海世紀嘉晉數字信息有限公司
版 次 二〇一九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9-14360-7 / Z · 94
定 價 柒仟陸佰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近代學術集林》

編委會

主 編

傅 傑

副主編

黃曙輝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澤遜	辛德勇	周振鶴	陳引馳
陳尚君	陳麥青	桑 兵	張京華
張涌泉	程章燦	虞萬里	榮新江
樓含松	劉永翔	劉躍進	嚴佐之

出品人

嚴 峰

工作組

組 長

黃顯功 王衛東

組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 亮	宋友誼	林振岳	胡欣軒
陳 軍	梁 穎	鄒西禮	劉 月

總序

傅傑

前賢身困道彌亨

每展新編輒眼明

——馬一浮

《近代學術集林》主要彙編影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者著作，這是中國學術隨着社會發生根本巨變的時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一八九八年，經學大師皮錫瑞爲同心會作序，即因學派不齊，議論不一而感慨繫之：

學派有漢學，有宋學。漢學有西漢大義之學，有東漢訓詁之學。宋學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世又有以專講中國學者爲舊學，兼講西學者爲新學。互相攻駁，勢同敵讎，心安得同？議論或好安靜，或好動作。好靜主守舊，好動主維新。守舊者以爲舊法盡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當一切不變；維新者以爲舊法盡不善，不盡改其法，天下無由而治，必掃地更新。一則近於道家清淨無爲，一則近於法家綜覈名實。分黨競勝，二者交讎，心安得

同？今欲同心，當化不同爲同。學派不齊者，當知漢宋之學，皆出孔門，不可分別門戶，同室操戈，即西學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補中學之所未逮，但有一得，並宜兼收；議論不一者，當知一切不變，施之今世，固不相宜。掃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難逮，宜去其太甚，盡其所得。至於學派通矣，議論一矣。

進入二十世紀，皮氏「學派通，議論一」的願望非但沒有實現，反因「孟賾失紀，海水橫流。大道多歧，《小雅》盡廢」，政局更迭，憂患頻仍，跟政治糾纏在一起，反而更加爭議不斷，辨難無已，正所謂「爭奇鬥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以致十來年後王國維在爲《國學叢刊》寫的創刊序中說：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新舊、中西、有用無用之爭，都被王氏歸爲無謂之爭。他下了大判斷：「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其實他本人何嘗沒有學有新舊、中西、有用無用的觀念，這裏語氣的決絕，態度的堅定，其實是他對當時學界熱衷爭長競短的浮囂之習的抗議：新鄙視舊，西鄙視中，有用鄙視無用，反之亦然。學者不僅各執一詞，標準也是因人而異——不論別的，王國維本人就因兼涉新舊中西，儘管受到廣泛推崇，卻仍有人嫌其太新，有人嫌其太舊。另如章太炎也同樣獲得了來自不同陣營者的截然相反的評價，即其《新方言》一書，或以之爲誼屬新學的開山，或以之爲不脫舊學的窠臼。

在特殊的時代，據形勢的轉移，最應該着力倡導怎樣的研究風尚與研究方法是一回事，但是再值得倡導的研究風尚與研究方法，也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學科、所有的研究對象，更不可能適應所有的研究者。研究者的天資不同，素養不同，學派不同，機緣不同，祇要真積力久，確有心得，無論用什麼方法從事的研究，以什麼面貌出現的著作，都有可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自古以來學術史的通例，近代也不例外。陳寅恪先生的「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固爲不刊名論，但如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那樣的「預流」之作別啟生面，石破天驚，足開一代風氣；而如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那樣的「不預流」之作一循舊規，句櫛字比，亦未嘗可輕棄。祇是多種因素交互影響，有的著作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成爲有口皆碑的名著；但也有數不在少的著作則漸漸淡出新一代學者的視界，被部分遮蔽甚至被完全遺忘——何況這其中有一些，還是從未獲得問世機會的稿本或抄本。

毋庸置疑，章太炎、王國維等爲學界公認的繼往開來的大學者絕對代表了這一時期的學術高峰。他們舊學邃密，新知深沉，天下翕然，奉爲宗師。近幾十年間，包括他們在內的不少傑出學者如皮錫瑞、廖平、嚴復、李詳、陳漢章、羅振玉、張元濟、孟森、梁啟超、柳詒徵、陳垣、馬一浮、余嘉錫、呂思勉、劉師培、吳梅、熊十力、楊樹達、黃侃、錢基博、岑仲勉、陳寅恪、胡適、郭沫若、趙元任、顧頡剛、湯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容庚、董作賓、錢穆、馮友蘭、傅斯年、李濟、于省吾、蕭公權、羅常培（上舉僅限於部分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生的學者）等的全集或準全集都已編錄出版，有的部分已有整理本或影印本，但仍有不少學者或未必經典、或不夠重要的著作沒有得到較具規模的流通。而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而言，這些著作還有參考借鑑的價值；對於文化積累而言，這些著作仍是可資利用的學術史或文化史資料。何況選擇何者經典，何者重要，有時還受到選擇者眼界與水準的侷限，未必就能形成終極的定見與廣泛的共識，或還需要經受更長歷史階段的檢驗。即使學術價值不高，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也可成爲後人總結教訓的材料。如吳士鑒是較早關注並收藏敦煌遺書的學者之一，不僅在未刊文集抄本裏有《敦煌石室古地考》、《敦煌石室殘本修文殿御覽書後》、《敦煌石室闕外春秋書後》諸文，另寫過《尚書釋文附校語》這樣的專著。該書校錄粗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受到經學名家龔向農先生的批評，龔著《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斥其「舛誤孔多」，「疏漏已甚」。但我們要全面認識敦煌學發展史，吳著也是早期文獻，何況亦非一無可採。有的更屬絕學，尤非常人所易得其要領。有鑑於此，我們承上海圖書館等相關單位的協助，編錄了這部《近代學術集林》，擬彙輯多家近代學者的著作，希望能爲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也對文化積累有所貢獻。

叢書均爲影印，或係稿抄本，或係舊刊本。

稿抄本中，某些是未曾問世的，如夏敬觀與吳士鑒的文集、沈曾植的日記。某些是已有整理本的，但稿抄本或有與整理本比勘的價值。稿抄本有的相對工整清晰，從事者如果細心負責，自可使整理本足以信據；但有的字跡較潦草難認，會給過錄帶來困難，整理本與稿抄本未必能全然相合，若經轉手過錄風險更大。我以前撰文指出過，同一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章太炎書信，姜義華、朱維錚先生編的《章太炎選集》據友人抄示的文本與馬勇先生編的《章太炎書信集》過錄的文本頗有異同，二者各有正誤。稿本可使學者比對，所以我們也把已有整理本的《春秋左傳》等稿本編入了《章太炎著作集》。

在刊本外再影印作者稿本，前人也有這麼做的。如曹元忠的《蒙韃備錄校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已收入《箋經室叢書》，後來王欣夫先生輯《箋經室遺集》，又影印了曹氏手稿，從中可窺見他校注時的增益。其書篇幅無多，這次我們就將刊本、稿本一併收錄。某些著作已有印本，但其稿本猶存，且跟曹氏《蒙韃備錄校注》一樣多見修改之跡，可讓讀者窺見其著述的歷程。如吳士鑒的鉅著《晉書斟注》，引書三百餘種，「旁搜博考，異者辨之，同者證之，謬者糾之，遺者補之」，雖以篇幅大、涉及廣，時有力不從心之處，曾受到楊伯峻先生《讀晉書斟注書後》等文的批評，但問世九十年，迄今仍是《晉書》最完備的注本，近年由中華書局據民國十七年吳興嘉業堂本影印，當初亦曾一印再印。葉景葵先生記：

第一次印本錯字最多，此第二次印本，業已校刻刊改。應再與原稿校對一過，以成定本。原稿係剪裁黏貼，歲久有散亂之虞也。

這是葉氏一九四一年的題識。當年「剪裁黏貼」而成的吳著原稿，並未像他擔憂的那樣慘遭「散亂」，還保存在上海圖書館。之所以不曾散亂是因為鮮有人查，甚至鮮有人知。這次影印收入吳集，足備學者稽考，更望可爲有像葉氏所希望的願執原稿以校印本來做《晉書斟注》「定本」的學者創造條件。

有的稿抄本上還有他人批校，如沈曾植《元朝秘史注》有陶葆耕、孫德謙、張爾田諸家校語，張爾田題記云：

庚午夏重校一過。先生此注不及李芍農之繁博，而精審乃勝之也。經陶松存、孫隘堪兩君校過，舛誤無多，今復重勘，足稱定本矣。

這些前輩手澤，也都片言可寶。

舊刊本也有不同的情況。有的印數甚少，如精研音韻與《周易》的徐昂，生前以線裝自印《徐氏全書》，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辭世後始出齊。他的著作駁雜，見解獨到，知音無多，所以儘管門人以及研究音韻與《周易》的學者並未忘懷於他，但徐著已殊不易見。某些民國時期的鉛印本，甚至較古刊本還難保存，已經亟需搶救，再不影印化身千百，可能即將蝴蝶羽化。更有某些著作是以蠟紙刻寫油印本問世的，如盧弼的詩文書信選集，薛學潛的《天文文字》。薛氏係晚清名臣薛福成之孫，從政之暇潛心鑽研，成書數種。當代易學名家潘雨廷先生多受其指點，在潘門高弟張文江先生記述的《潘雨廷先生談話錄》中反復道及，也引過薛氏的《天文文字》，但其書更少流傳。我們從前輩學者鍾泰先生的文孫處獲見油印者九冊，張文江先生推斷或屬海內孤本，商得收藏者的同意，我們收入薛集影印，俾其不致湮沒，留待後人研究。

某些著作已有整理本，但舊刊經學者精校，由作者認可。如《章氏叢書》由章門高弟錢玄同、吳承仕校理，在章氏致錢、吳二氏的遺札中，可以看到從質量到進度，他都反復叮嚀，一再過問，《小學答問》是否用原鈔付刻，如何保證字體不走樣，當中還有誤字須改，以及《文始》刻木上石，誰寫篆字最佳等，都是由章氏「欽定」的。有趣的是，他還明確表示過對「排印諸書」的不屑：

廿一日接到手書並拙著十六部，自二十一年秋冬間經營創始，至今二稔而贏，始克就緒，雖歷時稍久，然以視排印諸書朝耕暮穫者，必不可同年而語矣。

樣本中的脫誤，他都隨時更正，囑吳承仕「增改宜速」，須「督工人速爲剞補」。那已是在章氏生命的最後時刻了，而他依然念茲在茲。是以《章氏叢書》校勘精善，字體美觀，仍不乏收藏或參照的價值。所以我們將《章氏叢書》與《春秋左傳讀》等稿本一併收入《章太炎著作集》，以爲整理本《章太炎全集》的參照。

某些著作曾編集過不止一次，也有了整理本，但初編已罕見。如一九二七年王國維自沉，兩年後王氏友人羅振玉主持編纂了《海寧王忠愍公遺書》，是爲王氏著作第一次大規模結集，當時頗具影響，伯希和還在《通報》上發表了書評。時隔近十年，參與前書編纂的王氏助手趙萬里以羅編本爲基礎加工重訂，纂錄了更完備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是爲王氏著作第二次大規模結集。其中有的文章，趙編本據作者校訂本有所訂補。而入集者也有增刪，增者如《靜安文集續集》，乃是從《教育世界》等雜誌中補輯的；刪者如《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因原擬另編王氏不含箋注的古籍校勘類著作而被剔除。如今已經有了新編的《王國維全集》，而趙編本也由上海古籍書店暨後來的上海書店出版社改題爲《王國維遺書》一再刊行，但羅編本既有學術史上的意義，也是研究王國維仍需查考的資料，卻已頗不常見，以致冀淑英先生在爲趙萬里寫的傳記中，都把羅編本與趙編本混爲一談。我們在叢書中特收《海寧王忠愍公遺書》，以期爲學者的考索提供方便（至於一般讀者，我們仍建議閱讀趙編本或新編《王國維全集》）。

在首重未刊的稿抄本、批校本，次重校勘精良的木刻本，兼及稀見的石印本、鉛印本乃至油印本的方針之下，蒐羅學者著作編集影印。而過去有些影印本限於物力，常將四頁縮於一頁中，可資查考而不便閱讀，更不易體現原刻本的精良。今則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原大掃描。如盧弼《三國志集解》，收入本叢書的影印本顯較以往的縮印本更爲悅目。

三

編錄這部叢書的目標是務廣存真，力圖爲學術界瞭解把握近代學術全貌提供若干資料。也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纔有可能寫出較完備、較充實的近代學術史。在本叢書收錄的《含嘉室文存》的《復由夔舉雲龍書》中，吳士鑒云：

習齋顏氏之學，於朱、程、陸、王之外自闢徑途，矯晚明空疏之弊，求孔門實踐之功，閎識孤懷，獨有千古。恕谷李氏承其師說，崑繩王氏復左右之，其時北方學者翕然嚮風。恕谷一遊浙西，雖以毛西河之博辯縱橫，亦復推爲奇

士，凡所著述，皆就恕谷折衷。即方望溪與恕谷宗旨互有異同，而讀其《後集》，亦謂必傳之書。自乾隆中葉，漢學標幟甚盛，紀文達撰《四庫提要》，於顏、李兩家未盡褒許，然謂顏氏於孔孟之旨會通一理，正未可謂之立異，謂李氏引而歸之人事，深得聖人垂教之旨，是紀公未嘗不推崇之也。唐確慎《學案小識》薈萃成編，初非定本。李次青作恕谷事略，而以習齋附之，淵源所自，輕重失宜，殆於兩家書未暇深考。咸同之際，戴子高撰《顏氏學記》一書，表彰絕學，發微闡幽，而後博野之學，始大顯於世。定州王氏又遍搜兩家遺著，遍校刊行，承學之士益得取而讀之。故近三十年漸有定論，蓋駁駁乎與夏峰先生後先方駕矣。

述顏李之學在三百年間的不同遭際，正揭明了收集印行學者的遺著對全面認識一個學者的意義。例如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吳士鑒的《晉書斟注》，治古史與古文獻的學者類皆知之。但也許祇有通過本叢書的彙集，纔可能使更多的讀者瞭解吳士鑒還編著過《西洋通史講義稿》、盧弼還跟人合譯過《憲法》、《法學通論》。不過需要聲明的是，我們試圖廣羅學者著作，但做的並非學者的全集。編近人全集殊不易。稿本抄本分散在公私藏家手裏，何況還涉及真偽的辨別。所以真要編錄全集，即一家亦非經年累月不為功，如已出版的章太炎、王國維以及正在進行的沈曾植全集等都是如此。我們祇是依託上海圖書館等單位及部分私人藏家，利用現有的條件，抓住可能的機會，把較多近代學者的著作相對集中起來，便利保存，擴大流通。而我就即將首批付印的數種稍加檢閱，其內容的繽紛多彩，已經令人目不暇接。

夏敬觀的文集向未刊行，稿本今存上海圖書館，雖不能盡免應酬無謂的文字，但不乏可採的學術見解與可貴的文史資料。如二十世紀的復旦大學，五十年代之後最重要的校長自係陳望道先生，五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校長當推李登輝先生。一八七二年出生的李氏在十九世紀末畢業於耶魯大學，一九一三年成為復旦公學掌門，一九一七年復旦公學改組為大學，李氏擔任校長二十餘年。而繼馬相伯、嚴復出任過復旦公學監督亦即校長的夏氏則在一九四七年李氏逝世的次月，即向國史館提交了《李登輝先生傳》：

君姓李氏，諱登輝，字騰飛，閩之廈門人。廈門濱海，其民多行商南洋群島，輒久僑不返。君父諱開元，居積致

富，治產爪哇，居巴達維亞紅亞村，爲大地主。既而以商敗，傾其產，歿，家貧。君年十五，就學新加坡英華書院，旋赴美利堅國入耶魯大學，歷年久，且工且讀，得文科學士。時中國尚禁立學校也。光緒辛丑，拳亂平，清廷悔悟，廢舊制，許民興學。乙巳，君歸，從事外僑西文社誌。未幾震旦學校生徒以信教自由，拒隸教會，起創公學，易名復旦，丹徒馬君良主之。余自良識君，與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與爲友者四十餘年。君之蓄德淑行，蓋余所深知而服膺者也。當光緒末，召試諸遊學歸者，君不欲往，余敦促其行。既試，賜舉人，分部學習，君所學爲教育，而簽分外務部，君大笑，不顧而去。自是專志教育，不復一日離復旦。始復旦以吳淞提督署爲校，辛亥革命，爲軍所佔，幾廢，君假滬西李祠復之。既而身赴南洋諸埠，募金購地江灣，建築堂舍，今之宏規，君啟之也。君之設教也，誘掖來學，陶獎英異，增進校級，以達程大學，歷有年所，實諸學府之先進者。自始興迄今，群才繼踵出，皆君弟子。君年七十，值寇焰方熾，校內徙，顧不克盡從，其留者仍賴君維繫，敵不敢犯。寇平，校改國立，於是衆議建登輝堂紀君勳勞，而君已病目眚矣。今年十一月十九日，竟以腦溢血卒，年七十有五。配湯氏，前卒。生子三，不育，以弟第三子賢政爲嗣。君之友暨諸生徒，會葬君於八字橋長老會公墓。余與君交篤，且采衆議，宣傳君爲世學者模範，因爲文述君生平，爲之傳，備國史採擇焉。

該文字數無多，但作者跟李氏固非泛泛之交。他執筆復旦時李氏是教務長，「與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與爲友者四十餘年」，故而既清楚地梳理了復旦發展的軌跡，尤明晰地記叙了李氏對復旦的貢獻，把李氏「專志教育，不復一日離復旦」的經歷呈現在讀者面前，堪稱珍貴的復旦校史文獻。

本叢書中其他若干未刊稿本與抄本也同樣給我們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史料。如甲午戰爭後，一度賦閑的袁世凱重獲重用，得到了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大權，這是袁氏政治生涯的重要關節點。而他獲用之由撲朔迷離，衆說不一，要以台灣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大家張玉法先生的長文《袁世凱的仕宦階梯（一八八一—一九一一）》最爲精審。張文詳述袁氏早年備受李鴻章賞識，而當有志練兵之際，「除向盛宣懷、李鴻藻自薦外，亦設法爭取兵部尚書榮祿、戶部尚書翁同龢、慶親王奕劻、宦官李蓮英以及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的支持」，李鴻章不與焉。張文且進一步分析：

袁世凱得到督辦軍務處及清廷的信任，據有關資料顯示，似以三個人的關係最重要：一是他與軍機大臣李鴻藻聯絡，受到李的賞識；二是得關外舊友王英楷的資助，到北京結納太監李蓮英，而李最得慈禧之寵；三是因道員張景崇之助，與榮祿拉上關係，榮祿乃將袁薦之慈禧。從日後的史實來看，李鴻藻確是最早保薦袁世凱練兵的人，但不久袁又失去他的信任。

多種袁氏傳記以及相關文字，未見遇到如張說者。李鴻藻的保薦為袁世凱取得練兵權起了最關鍵的作用。但據吳士鑒記錄，李鴻藻所以力薦袁世凱，則袁氏的至交、李氏的幕僚張孝謙的遊說與引領功不可沒——這似乎是迄今所有研究袁氏的論著中未提到過的。抄本《含嘉室文存》中的《書張擧之遺事》一文稱：

光緒甲午中日之後，廷議主戰，合肥主和。時項城駐朝鮮，連電請兵，遂開戰釁，水陸敗衄，遣使議款。明年乙未春，合肥訂約於馬關，還朝復命，寵眷遂衰。於是開北洋直督之缺，僅令入閣辦事。合肥固與翁常熟齟齬，而尤勿善項城也。項城歸，謁合肥。合肥嚴詞峻責，謂其張皇入告，致啟邊禍，辱國喪師，鑄成大錯。項城面發頰，噤不敢辯。時項城已簡浙江溫處道，不願蒞任，逗留京師，別圖進取，京朝士夫，多與相習。商城張擧之前輩孝謙方官編修，居合肥幕府久，與項城交尤深。項城與樞府諸公，惟常熟以舊誼，得一進謁。而李高陽名位聲望，稍稍居常熟右，項城無由自達，謀諸擧之。擧之，高陽之門人也，亟游說於高陽。高陽令擧之挈以俱見，談次頗賞其才，乃與常熟合詞薦之恭邸。恭邸既見項城，亦謂其才氣可大用，且以其曾居吳壯武軍，略知兵事，而戰敗之後，重整淮軍，思得人而任之。至八月而小站創練新軍之命下矣。

張擧之亦即張孝謙是吳氏最相得的前輩「益友」，吳氏文中交代：「余時與擧之同官，兩共衡文之役，以道義相切劘，無旬日不詣擧之劇談，至則項城必在座，故於此事之顛末知之獨詳。」復述及其後果：

又明年丙申元旦，擧之詣合肥于賢良寺。坐甫定，合肥厲聲曰：「吾聞慰廷練兵之事，皆擧之一人之力，有諸乎？」擧之猝無以應。合肥曰：「慰廷可練兵耶？吾恐大清之天下，將亡於爾河南人之手矣。」夫合肥即甚明智，於辛亥禪讓之局，夫豈前知？特默窺官廷意旨，誓將雪恥復仇，倘他日啟釁鄰邦，必召覆亡之禍，故不覺言之激切耳。而孰知竟為後來之先識耶？

吳氏所述，未必就是袁世凱獲取練兵權的全部原因，他在文末且把袁世凱後來「縱橫恣肆，藉兵力以更國體」都歸於當初張孝謙的一手推動，更不免簡單化之嫌，但他的敘述親聞於當事人，有本有末，或可豐富我們對史實細節的瞭解。

再如曾被錢鍾書先生稱為「一代學人」的盧弼，年輩高，交遊廣，與錢基博、錢鍾書父子皆有交往，昔有錢鍾書研究者考論錢鍾書與盧氏的文字因緣，已僅覓得《慎園詩選》、《慎園文選》，盧氏自印的書信集《慎園啟事》則因印數太少無緣得見。其中除了致錢基博先生信，致錢鍾書先生的信亦頗有內容，或對錢著《宋詩選注》有所建議：

推陳出新，閱之快意，言語妙天下，雅俗共賞，鄙意開卷宜寫凡例數條，一覽而知內容，再閱三十葉之序文，一切瞭解。

或對近代詩壇大家有所譏貶：

尊公近代文學史，卷末論梁、胡，為良史定評。大札論陳、鄭、樊、陳，亦極公允。某君成見太深，進言不易。山谷、臨川，咸有特性，流風所播，習為固然。某君推鄭子尹為清詩巨擘。巢經本經生，閱其詩者尚須置《經籍纂詁》於左右參證，陶冶性情翻成苦境，邊區枯槁之章，執中原騷壇之牛耳，可謂突起異軍。南皮不喜宋詩，見蘇戡序散原集，亡國哀音，先機已兆。某君於散原、蘇戡外，亦稱蒼蚓。老友徐芷升謂，仁先同年，人可愛，詩可憎。弟與仁先經心書院同學，院生皆年長者，弟與仁先齒最少……不意後來詩境，與昔日綺年玉貌，背道而馳也。

以鄭珍爲清詩巨擘者夥頤。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稱其「卓然大家，爲有清一代冠冕，綜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陳聲聰《兼于閣詩話》稱其「以經學大師爲詩，奄有杜、韓、白、蘇之長，橫掃六合，跨越前代」，可謂推崇備至。盧氏放言無忌，直陳胸臆，對鄭詩的評價未必人人同意，要不失爲一家之言。

少盧氏三十五歲的錢鍾書實屬晚輩。在《慎園啟事》中，更有致胡玉經、張元濟、傅增湘、陳叔通、林宰平、瞿蜕園以及陳垣諸先生的信。陳智超先生所編《陳垣往來書信集》，一九九〇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其後「又發現了大批可以補充的書信」，二〇一〇年在三聯書店出版增訂本，字數已逾百萬。其中收盧氏信一通，但在《慎園啟事》中，另有一九三五年的一通：

前奉佳章，至爲感謝。《書目答問》著述家姓名略，有李漢，字雲門，鍾祥人（近日治考古學之李濟之即其後裔）；劉湘燧，字允恭，江夏人。劉氏又見《疇人傳》，撰著極富，章實齋深重其人，爲文推許之。大詩「楚材獨闕笑南皮」，謂南皮舉鄂人之少，則可謂未舉，似未允。若以楚材論，則所列湘人頗多。鄙省學風，不尚標榜，不能盡歸咎於南皮也。拙題胡綏之雪夜校書圖詩，亦有論《書目答問》事，錄呈教正。大著閎富，過於竹汀，檢閱目錄，如入寶山。拙撰《三國志集解》已鈔成，前以《魏武紀》送胡綏之審閱，綏之評謂考徵議論，兼擅其勝，地理尤精云云，自係過譽之言。遲日擬將全稿攜至舊都，就正左右也。

替自己的老師張之洞作辯護，對陳垣先生就《書目答問》的非議提出商兌意見，附及陳氏以及自己著作的評價，這通失收的信較已入集者更有內容，自然是不應漏略的學術史資料。

即盧弼詩集，亦多有可觀。盧氏「少壯荒攻音律事，高生五十始言詩」，就詩藝言固非本色當行，但其學養湛深，見聞博洽，又喜以詩議人紀事，自道「繪鳳雕龍慚不敏，聊將禿管寫吾真」，故詩中有史料，有見識。如他是經嚴復授權的《天演論》最早的出版人，詩中一再吟詠：

名刊天演初流佈，駭俗當時詫異端。

欲假太玄貽話柄，錯將姓字列籌安。

這是他的《近人雜詠》之一，其下自注：「光緒中葉，先兄木齋命余刊《天演論》於武昌，為最初刊本，幾道校稿猶存。」既揭示了《天演論》在當日的影響，又對嚴氏晚年名列「籌安會六君子」表示了異議。

哲學名言天演論，侯官嚴氏創鴻篇。

收歸慎始叢書裏，海內群推是覺先。

這是他的《七十一歲自述》之一，其下自注：「伯兄寄嚴幾道《天演論》稿本，余校刊於武昌，原稿猶存，以後海上翻印多本。」就詩而論絕非佳作，但卻別具史料意義。

《近代學術集林》的編纂剛起步，上舉祇是最先付印的第一輯部分著作中所見的例子。現在來闡說這部叢書的價值與意義，一來為時過早，二來更不是淺學如我所能辦到的——那無疑需要多領域的學者在將來共同的努力。但即便從這幾個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已可推知這是蘊含極為豐富的寶藏，值得廣大的同道來開採挖掘。我們為各集編了較詳細的目錄，並請編者或特約編者以外的專家撰寫前言，對其人其書或略予介紹，或詳加述評。如張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別錄》的《箋經室遺集》篇堪稱簡而得要，但以著作體例，自不必要也不可能展開詳論。而嚴壽澂先生的《曹元忠著作集》前言，則從「禮議」與「經說」兩端，詳剖曹氏立說的背景與得失，或有助於讀者對曹氏及其學術有更深入的體察。

四

《近代學術集林》工程浩大，編務繁雜，儘管我們抱有良好的願望，花了不少的氣力，但一來囿於編者見聞，二來限於客觀條件，絕無可能盡如人意。有的學者著作稿本乃至印本或藏於某些暫且不欲公諸於衆的圖書館、學術機構與藏家之手，即使知道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何況還多有我們不知道的。但就我們目前的所知所能，做得不完備至少比不做

好。如果能夠越做越具規模，也歡迎其他圖書館、學術機構與私人藏家參與進來。我們已做的工作祇是開端——唯願算得上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忝爲主編，我要特別致謝：上海歸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裁黃曙輝先生對近代學者論著有濃厚的興趣與廣泛的瞭解，曾標校《通志堂集》、《十七史商榷》、《鄭堂讀書記》迄近代劉咸炘、張爾田、孫德謙等人的著作數百萬言，叢書從策劃到製作，很多具體工作都是他操持的。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黃顯功先生與復旦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王衛東先生領導的工作小組，在自資料檢索至全書付梓的整個流程中竭能盡力，爲成書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證。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嚴峰先生對叢書刊行積極支持，精心佈置，使叢書最終得以現在這樣既大氣又雅緻的面貌問世。

二〇一七年歲末，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了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傳習的馬一浮書院。馬先生早年執掌樂山復性書院，講習之餘，兼及刻書，有感於「儒術既絀，群書剖散」，草擬了龐大的刻書計劃，認定「多刻一板，多印一書，即使天壤間多留此一粒種子」，無奈經費支絀，於是鬻字籌款，因作百句長詩《神助篇》——爲鬻字刻書作《以明志》：

亢龍行有悔，甘井自願竭。
無爲無不爲，此物非他物。
種智不可斷，浮生有時畢。
古來達道人，孰敢愛其力？
吾當罄形壽，收此煨燼籍。
任取覆醬瓿，或作糞土擲。
旦暮苟不盡，萬一猶可接。

後來到杭州主持智林圖書館，他設定的宗旨即「徐圖甄採精要，纂輯叢書，示抉擇於丹鉛，寓精神於刪述，存先民之槩